

文化符号学的新视角: 符号的感知 与意义的半自动生成

余红兵

摘要 意义的生成并不仅仅在于符号文本的结构,它是符号与主体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符号的主要功能是替代,分为外在与内在两种,外在符号强调符号的物质属性,内在符号强调符号的心理属性,二者相互依存,并且通过感知与内化联系在一起,而感知与内化又是意义生成的前提。人的情感与内在符号运算是意义生成的内核,它们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激发使得意义的生成呈现出半自动的特征。情感在符号学分析中的地位应该提升,它象征着主体的回归,而主体既是符号的源头、活动场和最终归宿,又是意义的生成场。

关键词 外在符号 内在符号 半自动 印刻 情感

A New Cultural-semiotic Perspective:

Perception of Signs and Semi-Autonomous Generation of Meaning

Yu Hongbing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is not only dependent on the structure of semiotic texts, but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influencing of signs and the subject. The sign, the main function of which is representation, exists in a dichotomy, i. e., the internal sign and the external sign. The internal sign emphasizes the psychological attribute whereas the external sign emphasizes the materialistic attribute. Both signs depend on each other, linked through two fundamental processes: percep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which serve as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Human emotions and the operation of internal signs constitute the core of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which, in turn, as a result of the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stimulation of both kinds of signs, takes on a semi-autonomous look. The status of emotions in semiotic studies should be promoted for this symbolizes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 which is the very source, working field and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signs, as well as the generative field of meaning.

Keywords external sign; internal sign; semi-autonomous; imprinting; emotion

一、概述

在新近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中,有

这样一条论述“谁说符号,就等于说意义;谁说意义就等于说符号;用符号(单独)作为基础不仅不正确,而且绝无意义。”^{[1][32]}而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也很明确地提出一种关系原则:符号与其

周边其他的符号的关系比符号本身的重要性还要高,所指不能被视作意义而独立存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也不能单独形成意义的完整性。^{[2](54-55)}显而易见,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意义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符号的异化存在物,甚至也并非所指。意义与符号同一。“没有符号体系,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其本身的意义也就是零。^{[3](3-6)}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的肇始,其《手稿》却展现出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颇为一致的观点,即意义是多元的、变化的甚至是无限的,因为符号与意义的同一就使得意义不再是符号的附庸,符号变,则意义变。

那么意义的生成是什么样的?赵毅衡先生将意义生成与增加称为“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4](33)}但人脑与电脑毕竟不同,后者能全自动地按指令进行逻辑运算生成“意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有着自动思考的能力,而且很多情况下,甚至连“指令”都不需要就可以生成意义,但人与电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意义的产生便不再仅仅是全自动的符号文本运作,也非情感的纯粹表达,而是主体的感知与认知、情感与符号互动的结果。意义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复杂性、不稳定性和多元性,这在洛特曼的符号圈(semiosphere)、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dialogue & polyphony)、索绪尔的组合关系与聚合(联想)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 & associative relation)、皮尔士的无限符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等理论假设中都得到了体现。

二、分类:外在符号与内在符号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两个范畴的符号概念:内在符号(internal signs),即存在于主体大脑中的内隐符号;外在符号(external signs),即主体之外的外显符号。这样做有其充分的理由:人在面对陌生的对象物的时候,其本能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追寻意义的思考过程,事实上是人类(甚至其它动物)对陌生事物所进行的一种内在的知识性的同化,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符号性内在化(semiotic internalization)。

这样一来,外与内的区分就触及到了符号的“物质性”问题。很多研究符号问题的人都主张符号的

物质属性,如莫里斯就坚持符号与其对象都是物质;相反,索绪尔、皮尔士以及艾柯都强调符号的心理性和非物质性。比如,根据索绪尔的符号解释,符号应完全是心理性的“语言符号所统一的并不是事物和名字,而是概念和声音形象。后者不是物质性的声音,纯粹物理性的东西,而是该声音的心理印记,是其在我们的感知上留下的印象。声音形象是感知性的,我如果称它为‘物质’,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且是对比于符号组合体的另外一个总的来说更加抽象的术语,概念。”^{[5](66)}其实,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非物质性其实并非指“抽象”,他本人也并不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所提出的语言符号,^{[6](17)}其符号图式所展示和强调的是心理性,而非形而上学的抽象。这种心物矛盾长期存在,看似无法化解。

其实,对于符号过程的阐释,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维度加以关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给符号做这样一个二元分类,即上文提出的“内在符号”和“外在符号”,即符号兼具内在性和外在性。将符号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进行分析,需要将两种看似矛盾的特性相统一。不可否认符号的心理性,因为人是通过符号而且只有通过符号才能思考的,这一点,皮尔士、索绪尔、恩斯特·卡西尔、苏珊·朗格等达成一致,他们都强调了人类思想的符号性,甚至将思想与符号相提并论,二者是不可分开的同一体,这与奥格登和理查兹提出的“意义三角”有本质的不同。^{[7](10-11)}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符号可以有物质性的表现,如图腾、仪式、旗帜、文字、声音、颜色等等,正如白春仁先生所说“何谓符号,暂也不需作深奥的辨析。用常识判断,符号总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用它代表另一种东西,可以说是它物的替身。事情就这么明白,不过这‘替代’呈现多种情形,有深有浅,有隐有显,有广有窄,有繁有简。”^{[8](70)}说到底,符号的作用在于意指(signification),简而言之就是“以此代彼”,替代(representation)。外在符号与内在符号都是符号,都有替代的功能。

外在符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为符号意图(semiotic intentionality)下创制的符号,即外显表达的符号,内在符号在这里扮演了基础的作用,外在符号和内在符号此时分别对应索绪尔的“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另外一种是利用现成物,将其视作符号。外在符号的物质性,相比较而言是直接而且明显的,甚至人们一度用“符号”来指称所有他们理解为符号的外物,成为一个最常见的日

常词汇,其实它指的正是这里的外在符号。人们对于外在符号的这种情感和认知的倾向还经常使得符号学中的“符号”概念让人迷惑不解,甚至有画蛇添足之嫌。因此,本文将符号分化为两种异质、同构、同功能的类型,部分地也是为了缓和这种术语上的矛盾。

内在符号,也就是索绪尔、皮尔士、艾柯等提到的符号。其作用就是作为意义生成的质料,内在的符号运作为人类思想的本质。“人类所特有的心灵生活超出了纯粹的动物性,符号性被人们公认为是其关键。符号与意义创造人的世界,远超过了感觉。”^{[9][21]}“对皮尔士来说,人类的认知活动,包括感官的感知、情感感受,以及指称推理,包含了‘内在符号’,这些内在符号一方面在无限序列的心智‘对话’状态中互相关联,另一方面与表现为符号对象的外在现实相关联,符号对象的互动方式与符号关系组成要素的互动方式类似。”^{[10][24]}因此,我们可以



图1 意义生成链图式

图式中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内在符号的外化”和“外在符号的内化”尚未涉及到意义生成的内核,外化属于行为层(behavioral plane),内化紧随感知层(perceptive plane),属于前意义层(pre-meaning plane)。内化与内在符号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作为一个先于认知的临界点。其二,外在性和物质性在这里得到强调,然而仅仅限于外在符号及其可能外显的物质形式,并不暗示任何意义“包裹”的存在;其三,这条链并非是封闭的,而是一个选段,主体外化的符号有其内在符号基础,在完整交流的情况下也有另外一个主体感知,因而A的前面有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A'的后面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以此类推。具体如下:

A. “内在符号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internal signs)指的是人脑中符号进入物理世界即外在空间的表达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涉及到的正是索绪尔所提出的“言语”(parole)范畴,与“语言”(langue)范畴对立。

B. “感知”(perception)指符号的接收,但并非是接受。人们每天感知到的各类外在符号和刺激多不胜数,并非每个都会产生意义,多数则是被自然过滤。

C. “外在符号的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signs)看出,意义是人的内在的符号机制。

外在与内在的两种符号并不矛盾,而且互相依存,互为前提:没有外在符号,就谈不上内在符号,因为后者无法形成;没有内在符号,外在符号也就失去了内部照应,就是混乱或者无用的存在,无法行使意指功能,意义自然也就无法生成,而且,人类文化的外显实质就是由内部符号通过聚合、组合关系,在外部世界展现而形成的外在的符号圈(semiosphere)。

三、意义:主体的回归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条意义生成链,单向行进,以此作为典型交际过程中符号意义生成(interpersonal generation of semiotic meaning)的新图式。事实上,意义的生成并非是单一线性的,以生成链的形式作为展示,仅仅是为了强调其过程性。

signs)是指外在符号通过感官的感知进入准意义生成阶段(quasi-generation of meaning),作为内在符号运作的临界前提,其本质可以用“符号印记”(semiotic imprinting)或“符号唤起”(semiotic evoking)来形容。“印记”来源于柏拉图在《特艾特图斯》中提到的记忆“蜡板模型”(Plato's model of the wax table),《特艾特图斯》描述了苏格拉底参与的一次对话,“为了区分思考与感知,苏格拉底解释说,感知对象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意识,思考对象则是通过印记在思维里而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性的感知对象。”^{[11][15-16]}“唤起”是主体内部的反应,其本质是一种符号对应,从认识论和历时的角度来说,印记一般发生在唤起之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两个概念是从受者的角度出发,分别对应已知的符号和未知的符号。尚未形成内在符号的情况下,比如刚出生不久的婴孩,作为符号受者,外在陌生对象(此时还并非符号,因为不涉及指代)的感知为他创造了获知的机会,通过印记(imprinting)进入人的记忆,以备后来被“唤起”调用,这样就在思维中形成了外在陌生对象的心理印记。在心理印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它们通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归属到相应的符号类别,这也反过来对组合和聚合进行了再确证和强化。外在物之具备符号性,一种可能是内在

符号外化形成外在符号来行使意指作用,所以外在符号与内在符号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和异化,因为它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特殊化过程;另一种可能是外在物被“当做”符号来行使意指作用,这是在以内在符号体系作为支撑的基础上一种特有的意指活动经济性,任何一个能够用来意指的事物都可以作为符号,“符号学关涉可以被当做符号的一切事物,符号是可以被当做意指性替代它物的一切事物。”^{[12] (7)}

D. “运作”的过程,类似于一般的“解释”、“释解”或“阐释”。术语采用前者而非后者的理由是: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主体在“理性”地组合符号继而“解释出”意义,因为符号性是思考的本质,思考就是内在符号的运作,是符号自己在完成组合,理论上能够自主形成无限的符号链。^{[13] (43)} “内在符号”对应的就是传统符号理论中的“符号”,而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价值、皮尔士强调的无限符号过程、洛特曼强调的符号圈,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内在符号通过结构、关系或互动而形成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意义就是通过内在符号的运作而自动生成 (autonomous generation)。

然而,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因为这样的解释也是有问题的:一者,人的主体在这些意义模式中并未出现,忽略了“人”也就是忽略了符号问题的核心,因为意义是属于人的,也是被人赋予的;二者,即使在人的主体性与符号性之间画上等号,但如果没有说清主体性如何得以展现,为何它能与符号性挂钩,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消解了主体性,因为在传统的意义模式中,主体并没有参与意义生成,只有轻描淡写地提到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人的本质、人赋予符号意义等等。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人与机器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将人视为“符号动物”以区别于其他动物,虽有其特殊的价值,但从人的本身出发,这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图景,而且从生物符号学 (biosemiotics) 角度来看,人作为符号动物的命题并没有将人与其他动物完全区分开,仅仅是指明了符号使用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因为其他生物的符号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14] (32)}

人的主体因素在索绪尔与皮尔士的符号模型中都被消解和忽略,而它们都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中受到了批判。洛特曼认为这两种模型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子因素,而且后来的一切都是从类似的视角加以考虑的”,^{[15] (206)} 他拒绝将符号、文本看作是单一自足存在的本体,而是将它们视作符号

圈的组成部分,符号形成文本,文本再形成文化,文化再形成符号圈,意义在符号圈的边界 (boundary) 通过文本的翻译 (translation) 而产生。^{[16] (104)} 然而,无论是将单独符号当作意义的来源,还是把符号放到符号圈中,主张意义通过翻译产生,人的主体意识始终处于较为朦胧甚至被忽视的状态。

那么完整的意义图式究竟是什么样的? 人的主体性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并通过什么来展现? 也许我们能够从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符号是一种意指实践,不具有封闭性,不是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点,符号包含着主体人的种种欲动,具有开放性和意义永不终结性。”^{[17] (146)} 她从新的角度出发,将主体引入理论分析之中;在研究符号结构的同时,也将结构之外的东西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其中就包括了精神分析学。结构之外就包含外文本与人的主体,有主体的存在便有“欲动”的存在。她提出,符号具备两种形态,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前者指的即是一种“欲动”,在历史维度上先于后者,意义在前者到后者的转化中产生,而且处于不确定状态,经常产生多重意义。这与本文所探讨的“印刻”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符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有着早期“内化”的基础,而在早期的过程中,意义与结构并未产生,直到内在符号的量达到一定程度,能够通过聚合、组合以指代外在经验时,真正意义上的“意义”才出现,即便如此,外在经验和外来符号的变异经常使得主体在此进入这种“欲动转化”状态,正如克里斯蒂娃所指出的,意义在此时往往难以理解。

克里斯蒂娃的主体回归,倾向于精神分析和潜意识的欲动,开拓了符号学研究的新视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社会心理学,为本文的符号学探讨引入两个概念,即跨越潜意识和意识双域的“情感” (emotion) 与“动机” (motive),作为“欲动”的代替术语。情感的发生有其潜意识的一面,而且不受人为控制,包括快乐、悲伤、厌恶、接受、恐惧、愤怒、惊讶、期盼等等,^{[18] (6)} 不过,情感也被人的意识查知,虽然在控制方面时有难度,但人们常常能够“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情感;动机虽然也有其潜意识的根源,但它的效力和结果常常与意识、行为等联系在一起。情感与动机在符号过程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前者与意义生成即内在符号运作 (图式中的 D) 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动机则更多地与内在符号的外化即符号表达 (图式中的 A 与 A') 相联系。本文中对于意义

的分析将侧重于情感与内在符号的运作方面。

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的符号模型,无论是从二元、三元关系还是从结构、文本或文化的角度出发,都倾向于将符号与意义视作自足的本体,已经将意义的生成理解为脱离于人的全然自动的过程,而且完全剔除了主体因素。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主张将主体重新纳入理论分析之中,因为将人完全剥离出体系之外而谈论符号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无根据的。人的主体性回归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一切都要返回到主体上面来。这也意味着对人类情感等内在原动力的正视,而符号意义生成过程,也就是情感与内在符号的结合过程。

作为意义生成的真正内核,二者的结合并不像索绪尔二元模式或皮尔士三元模式那样显得紧密粘连,如同一张纸的两面;应该说,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情感之于内部符号,正如沟壑之于流水,前者牵引后者,河床既与流水作用,但又不完全决定后者本身的自然流动;流水对于沟壑也会有其反作用,能够冲刷河床与堤岸,或者漫过沟壑,汇到、引向其它沟壑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影响到原来的沟壑,使其改道,甚至也会导致洪水。情感并不会严格限制内在符号的运作,内在符号也不会经常性地“泛滥”,导致意义如洪水般的产生,但二者的相互作用是明显的。也正因为如此,意义的生成是“半自动”的,是内在符号“自然流动”与情感“牵引”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为什么“一千个观众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不光是因为每个观众的内在符号存在不一样的可能,更是因为他们的内在符号运作过程不一样。在同一场剧目表演中,同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具有单一性,是单次的事件,对于这样一个同一的外在形象,每个观众的“理解”都融入了其本人特定的情感因素,个人的好恶与预期在这里影响到了哈姆雷特形象的意义生成衍化。

意义的半自动生成模式在许多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中也得以证实。比如,在所罗门·阿什所做的一个实验中,实验者给被试两个单词完全相同但顺序不同的句子,然后要求被试对句子所描述的人物进行打分评价。“史蒂夫聪明、勤奋、冲动、挑剔、固执、好嫉妒,”和“史蒂夫好嫉妒、固执、挑剔、冲动、勤奋、聪明,”实验的结果显示,两个“不同”的史蒂夫所获得的评价相差甚远,情感在这里引发了“前因效应”(primacy effect)。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而且结果证明都是相同的。^{[19][131]}传统的符号学理论在这

里失去了解释力,因为主体的情感因素被抛却。可以看出:这里外在符号完全一样,相对应的内在符号操作即意义的生成却因为所引致的情感而显得如此不同。情感与符号的相互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使得意义变得扑朔迷离,这也就使得多元化解释成为可能。从文化符号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文化不再被看做是匀质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存在形式,也不再被看做是完全由外在社会决定的符号体系;人的心理因素也对文化产生着重要作用,与文化形成互动关系”。^{[20][35]}文化的非匀质性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圈”理论假设中也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和确证,其非匀质的基础不仅是因为符号的不同,也是因为与符号相联系的人类情感的复杂和不同。

四、结论

外在符号的感知与内在符号的运作,是意义生成的两个最重要的步骤,前者是外在前提,后者是内核。在感知与内部运作之间存在着一个临界的连接:内化。内化的作用体现在未知符号的印刻以及已知符号的唤起。与传统的意义传输论和符号学意义理论不同,本文所提出的意义的生成呈现出半自动的特征,提倡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将符号结构本体描述与人的情感等主体因素联系在一起,因为,客观地说,主体是符号的源头、活动场和最终的归宿。情感与内在符号运作的相互作用导致意义的生成,二者相互激发,相互联系。意义的多元解释也因此而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 [1]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手稿 [M], 于秀英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 Barthes, Roland. *Elements of Semiology* [M], Annette Lavers & Colin Smith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 [3] Burke, Kenneth.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M],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4]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5]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Wade Baskin (tra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 [6] Chandler Daniel. *Semiotics: the Basics*, 2nd edi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7] Ogden C. K. & Richards I.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46.

[8] 白春仁: 文化的符号学透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 2004 年第 6 期。

[9] Langer, Susanne K.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Reason, Rite, and Art* [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4.

[10] Parmentier, Richard J. Signs' Place in Medias Res: Peirce's Concept of Semiotic Mediation // *Semiotic Mediation: 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C], Eds. Elizabeth Mertz & Richard J. Parmentier. Orlando: Academic Press, Inc, 1985.

[11] Whitehead, Anne. *Memory* [M], Oxon: Routledge, 2009.

[12] 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Petrilli, Susan & Ponzio, Augusto. A Tribute to Thomas A. Sebeok // *Biosemiotics* [J], 2008, No. 1.

[15] Lotman, Juri, On the Semiosphere, Wilma Clark (trans.) // *Sign Systems Studies* [J], 2005, No. 33.

[16] 康澄: 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J] 2006 年第 2 期。

[17] 孙秀丽: 符号实践的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研究//外语学刊[J] 2009 年第 6 期。

[18] Turner, Jonathan H.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the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9] Aronson, Elliot. *The Social Animal* [M],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1999.

[20] 纳日碧力戈: 语言人类学[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我的挚友李兆林

2012 年 1 月 9 日, 李兆林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与他相识数十年, 对他的品德学识, 我一向十分敬重。如今震惊之余, 思绪惘惘, 历历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1949 年 9 月, 我进入刚刚创建的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1952 年年底, 我提前毕业, 留校任教。北京师范大学与北大近在咫尺, 俄苏文学人才济济, 实力雄厚, 李兆林同志留苏归国后, 长期担任俄语系的领导职务。关于他的大名我早有所闻。1979 年 9 月, 在哈尔滨召开全国性的苏联文学研讨会, 李兆林同志和我都前往参加。这次会议, 为适应国家形势的需要, 成立了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后改称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我们两人, 作为各自单位的代表, 当选为该会理事会的理事。从此, 我们间的交往便逐步增多, 内容也日益充实起来。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受国家教委的委托, 北京大学俄语系与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九所高校的俄语专业共同协作筹措编写《俄苏文学史》。1981 年 9 月, 由 12 位学者组成的俄苏文学史编委会正式成立。曹靖华任主编, 李兆林是编委会成员之一。曹老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 季羨林教授也到会祝贺。这部文学史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俄苏文学通史。全书共分三卷, 包括俄国文学、苏联文学、苏联当代文学三个部分。北师大老师们承担了重要的撰稿任务。我作为副主编之一, 具体负责第二卷的统稿整理工作。由于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文化界、学术界拨乱反正, 清除左的教条主义影响的工作相当艰巨。对苏联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作品的评价, 众说纷纭, 有时甚至针锋相对, 争论异常激烈。在统稿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真是不少。我常常和兆林兄一起商量、分析、切磋、交换意见, 部分章节还请他执笔修改。要知道, 这类问题很难处理, 往往费力不讨好, 会惹起麻烦, 然而, 兆林兄不计较个人得失, 勇于担当, 埋头苦干, 默默地付出大量心血。他在工作中凸现出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乐于助人的襟怀和严谨踏实的作风,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通过这次合作, 我们之间不仅增进了认识、理解, 还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这实在说是一种缘分! 兆林同志的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为北师大俄语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殚精竭虑, 呕心沥血, 奉献出自己全部智慧和力量。他的成就业绩为大家所公认, 无需我一一细述, 以上只根据亲身经历, 谈一些自己的感受, 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我和兆林兄又同是老龄哮喘患者。多少年来, 风风雨雨, 同病相怜, 彼此感同身受。平时每隔一段时间, 相互总要问候, 或交流信息或共同鼓励, 以期安度晚年。2012 年元旦前夕, 我给他家打电话, 谁料他又住进医院, 未及春节, 便与我们永别了。痛失挚友, 不禁潸然泪下, 奈何奈何! 草就此文, 以作怀念。

2012 年 3 月 2 日北京大学
岳凤麟